

Fresh Air Fiend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旅行笔记

读梭罗克斯的书就是开始一次内容丰富的旅行，
所有愉快的旅行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美] 保尔·梭罗克斯 著
李 斯 译



海南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LT0000394360W



I712.65
114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旅行笔记

读梭罗克斯的书就是开始一次内容丰富的旅行，
所有愉快的旅行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美] 保尔·梭罗克斯 著
李 斯 译



海南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美)保尔·梭罗克斯著;李 斯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1

ISBN 7-5443-0675-5

I. 喜… II. ①保…②李… III. 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0835号

原书名:Fresh-Air Fiend

Copyright © Cape Cod Scriveners Co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2-167号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著 者 保尔·梭罗克斯

译 者 李 斯

责任编辑 严 平

特约编辑 许 彬

出 版 海南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发 行 海南出版社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科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13.25

版 次 2003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443-0675-5/K·62

定 价 28.00元

序 做个异乡人

我一辈子有很多次长时期生活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一直都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异乡人。我自问，自己的这份异乡感是否就是人类的境况。这显然是我自己的境况。跟大多数人一样，我外表上的生活极少类似我的内心生活，但是，身处异国他乡却强化了这样的里外差别。有时候，当一个异乡人就如同唤起了一场梦境，又有一些时候却如同自己在一种疯狂状态里，这么来回倒腾实有不便之处。我也许已经回到家里了，但回家的感觉却让人深感失意。不仅我的人很远的地方，而且经常还联系不上。听起来就好像我在描述根本没有解决办法的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但是，不，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形式的超度。

我在成为一个旅行者之前便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我在当旅行者之前便已经是一名作家，我觉得一件事情导致了另一件事情。有一次我跟朋友奥利佛·萨克斯提起这种异乡感，他说：“在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中，开天辟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逃亡。”这话对我有针对性。

逃亡是一个大概念，但我选择了较小的一个概念，那就是放弃国籍。我就这么离开了。我一家一共七个孩子，是很大的一个家庭，大家都爱说话，喜欢彼此取笑，因此我极想有自己的空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间。我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是读书,读书是一种避难处,也是一种自我沉醉的方法。但我最大的快乐还是要离开我那过于拥挤的房子,到外面去进行整整一天的步行活动。到后来,步行便成了外出野营。走运的是,我家就在城边上,因此,我只需要从大门走出来,走半英里地便置身林中了,那个林子还有个很诱人的名字,叫神秘荒山。在我自己这一方面,我对自己是谁有比较清晰的感觉,对我在林中发现的东西也有相当认真的好奇心。树木、花朵和鸟儿的分类法是我在这个新世界里学到的一种新的语言。

我去非洲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没有出版过任何著作,我在非洲成了一名姆赞古,或者叫白人,但是,这个奇切瓦字还包含有一种灵魂的意味在里面,是一种带有灵魂的人物,几乎是一种小妖,是仅仅具备人形的一种边缘生物。对于这样的定义,我一定也不觉得难于接受。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总有某种东西需要去验证。因此,谈到我自己作为一个旅行者,是谈论作为一个作家的我最符合逻辑的方式。

至于我当作家的学习过程,我肯定自己一心为之的心态受到了与众不同现状的帮助。当一个陌生人,与众人脱离日常接触,这两点在我看来是彼此有关联的。不管去哪里,我都相信自己是一个陌生人,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甚至当我处在自己的家人中间的时候。在我自己一生的很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感觉与众人没有多大牵连。你想像作家会处在与事物的接触当中,你想像作家处在万事的中心,但是,我看到的却是相反的事情。

谈到这个概念,其中的一个题目曾是大学里进行过热烈讨论的。我读大学的时候,这曾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异化

的英雄,或反英雄,即漂流者,就是加缪的《局外人》中随意和与众脱离的杀人犯麦尔索这个人物,或者《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柯夫这样的人物所浓缩的典型,或者是卡夫卡的《审判》中身陷僵局、干什么都不成的约瑟夫·K,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对于看不出任何明显原因而抱怨和陷害他的那种漠然无知。在我看来,有某种怪异之处存在于这些人的身上,也有某种对这种气质的公式化的内容存在其中。我发现这些人物和那场讨论不太有说服力,因为那些人物看来都像一些道德剧中供人嘲笑的人物。对于下面的句子,我并不能够使自己与之认同:

我,一个陌生人,在并非由自己
创造的一个世界里担惊受怕。

如果有一个描述出失落感或深沉的隔离感的完整、饱满的人物,那我就会受到深刻的影响。战后法国有一本小说,里面的人物据说感到了异化,这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如果那样的痛苦是一望便知的某个人感觉到的痛苦,比如费茨杰拉德《温柔之夜》中的尼柯拉·戴弗尔,或威廉·史泰龙《在暗夜中躺下》中的佩顿·洛夫迪斯,或格林《权力与荣耀》中的“威士忌牧师”,那么,那样的苦闷便会鲜明得多。当沉着镇定的小说大师谈到异化的时候,那是多么大的一场震惊啊。费茨杰拉德在《中毒》中谈到了酒精,格林在《一种生活》中谈到了狂躁-抑郁型精神病,史泰龙在《可见的黑暗》中谈到了自杀性的压抑。亨利·詹姆斯是极善社交,精力充沛过人的餐桌客人,但是,就连他也曾体会过数次精神崩溃和多次精神压抑。佐热·路易·博尔赫斯曾写道:“我在一首谈古代食物的诗里讲到过英雄的事情:羞辱、不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快、不协调。那些东西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来改变的,因此,我们不妨从自己生活悲惨的情景当中创造一些永恒的事物,或者热望于能够这么做。”

詹姆斯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透露过异化的痛苦,没有任何一种描述比詹姆斯的描述更为明显,那位朋友在可以称作是他的出发点的地方轻描淡写地利用旅行比喻问了一句——为了当上一名作家,他为自己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港口”。詹姆斯回答说:“我出发的那个港口,我觉得,就是我一生最基本的孤独感,而且在我看来,我的航行路线最终也是直接导向那个港口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得到安慰。这样的孤独(自从我提到它以来!)——关于一个人的最深刻的一面是什么?在我这方面,它处在比一切更深的层面上,不管怎么说都是如此。它比我的‘天才’深,它比我的‘自律’深,它比我的骄傲感更深,最重要的是,它是艺术的最深刻的对抗。”

英国作家普里切特曾在自传里谈到过这样一种身处异乡的状况,他说,直到远离自己在伦敦南区的家,他才开始明白自己,也明白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他说,他发现遥远的地方极其适合自己,竟然使他在自己的家里倒觉得像个局外人。旅行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他写道:“我成为外国人。对我自己来说,那就是作家应该是的一种人。一个生活在国界另一头的人。”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不太容易当个外国人(我是在普通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但是,在不到四十年以前,对我却是相当容易的,当时,我还是一个默不出声、很难为人记住的少年和半移民。当时,一个人只需要通过旅行就可以简单地消失掉;哪怕去欧洲的旅行也能让人遁入无名之中。去非洲或南美的旅行就如同消失在无声与黑暗之中。

消隐自我的概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在约十年的时间里,也就是我 11 岁到 20 岁的十年里,我完全跟外界失去了联系。我于 1963 年去了非洲,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然后,我不是回头返回祖国,而是去了新加坡,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 1971 年末才露面。那个时候,我将自己埋葬了,一家人生活在英国乡下无人知晓的状态里,生活在靠近一个村庄的地方。在这全部的时间内,我们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我没有电话,我打过的几个电话全都是处在紧急状态的时候,报告出生与死亡消息,召唤医生,全都是用借来的电话打的。这十年我们远离电话生活,而没有电话是与外界保持隔离状态的最严厉的形式,它对于我的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是我当一个作家所必须经过的道路当中最好的事情,因为它迫使我过着捉襟见肘的拮据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又是没有办法回头重新过的。我处在隔离与被启迪的状态里。我学会了如何对付各种问题,我读了很多书,我写了更多的东西,我没有电视,因此我思考问题更为专心,我生活在一个地方,我仔细研究什么是耐心。

“交往频繁”是这些日子以来众人赞赏的一道呼声。与人交往使一些人傲慢不倨,没有耐心,凡事匆匆忙忙,自以为是。我的年龄大到了足以见证电话的兴起,看到了电视的神化,还看到了录像机,还看到了手提电话,看到了呼机,看到了传真机和电子信箱。我不怀疑迅速的通信对商业有利,甚至是对出版业有利,但是,对于文学来说,这些东西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甚至有可能还对文学造成了损害。从许多方面来说,彼此交往是有灾难性影响的。我们把信息(太多了)跟思想(太少了)混为一谈。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当中,我发现了更多关于世界和我自己的道理。

彼此关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案卷保管人喜欢细节,他们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大吹信息时代,但是,他们对于私人电话、电子邮件和电子信息能做什么呢?迷失了!一个总统被弹劾了,尽管有很多电话和进行了很多调查,但他退位的惟一的证据就是少数一些廉价的礼物,一张签过名的照片,还有一些看不清的污渍。这就是信息时代。我的一些恶意批评者可能会说:“你可以打印电子邮件。”但是,谁会把那些废话打印到纸上呢?

至于音像革命,著名的太平洋考古学家英雄筱原告诉我说,他见到的人类文化当中发生得最快的变质就是录像播放设备发明之后,这种设备由发电机输送电力,后来在太平洋的库克人当中流行开来。现在,那里的村民们都在看兰博电影节目,还有色情节目,结果对一个节俭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去年我去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位妇女说,她要飞往亚马逊河的门劳斯去看她丈夫,因为她丈夫在那边工作。她很想早点去那边,因为《泰坦尼克号》正在那里的剧院里上演。四个月之后,我去了巴拉望岛,那是菲律宾的一处偏远的岛屿,并在海滩上行走,我听到一名菲律宾男孩子在哼《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依旧》。

无孔不入的流行文化会改变电子媒体中的连续的革新,对此我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像玩具制造与化学战之间的一个桥梁。我生活在电子革命时代的全过程当中,深知我看到的许多东西不是进步,而是自大狂。这是有误导性的,会形成知识的错觉,而这事实上正是最深刻的自傲。很明显,通信的进步正在快速行进,你能够准确地辨别一些人,给一些人作出典型描述,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以光速在书写着。

但是,当然,并非全世界。全球化的虚幻概念最怪异的一面

在于这么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世界是彼此连接着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立即联系上。这只不过是一个有害的幻想。为移动电话或计算机而做的色彩斑斓的广告，是不切实的，更不用说是虚假的。地球上仍然有很多地方是人们无法联系上的，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或政治及宗教等的背景不允许做到。意大利南部巴西利卡塔的偏远地区有很多乡村是与世隔绝的，跟它们在过去的许多年代里一样。

在过去的十年里，自从1991年发生了争端和并没有为人们所接受的选举过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全部国土都属于外人莫入的禁地。阿尔及利亚是地中海沿岸一个阳光灿烂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它与欢乐的摩洛哥以及色彩斑驳的突尼斯相毗邻，那是背包旅行者最爱去的地方，也是地毯收藏家光顾的地方。如此紧邻的国家使彼此间的对比格外醒目，在过去便是如此。在彼此紧邻的附近的地方，有世界上仍然被禁止入内的国家，或称未探明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外来者敢于闯入。虽然我们彼此都联系得很紧，但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在阿尔及利亚，每天都在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要找到一个外人莫入的禁地，人们并不需要走得太远。在许多年里，北爱尔兰一直都是城镇与邻近的要塞组成的一个拼凑物，它们生活在对于基督教的不同教义的解释当中。如果你属于另外一种基督教徒，那你可能被杀死。有很多纽约人觉得去火地岛算不得什么大事，但他们很少亲自到纽约市的某些地区去。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地方都同样危险，我只是想说明，人们认为有些地方是很危险的。

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人们现在都能彼此联系起来了，但也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无法联系上，许多人生活在封闭的文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化当中,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旅行者都不得进入全阿尔巴尼亚,而阿尔巴尼亚人也不准随便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样的隔阂于十年前左右结束了,因为那样的一些禁闭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形成的,因此,阿尔巴尼亚人发现自己很难调整过来——如果用临床学上的话说,那就叫作“补偿不全”——他们经受了十年的动乱,经历了一种政治上的痴呆症,这在一部分是由科索沃冲突引起的。几年以前我在阿尔巴尼亚。对于我来说,那是对过去的回眸一望,而且,顺便说一下,那是一个没有国际长途电话的地方。

世界上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地方。赞比亚人的首都是卢萨卡,他们发现自己跟比如洛杉矶人联络起来甚是方便,只需要拿起电话或登录互联网就行了,那比他们跟自己国家的西部省份里的洛齐斯人联系起来方便得多,那些洛齐斯人生活在没有电力,没有电话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连公路都没有修。对洛齐斯人来说,生活在延续,虽然遭受了干旱和疾病的折磨,但他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来说在隔离中反而丰富了许多,也更连贯一些了。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偏远地区,就算不说是受了褻读的,也可以说是被忽略了的。为此我们都要感谢上帝。但是,这些地方受污染也都是迟早的事情,其结果可想而知。我已经在许多国家见到过这种情形。1963年我第一次到西西里旅行,1966年到乌干达,1973年去阿富汗,1979年去洪都拉斯,1993年去阿尔巴尼亚,在每个地方我都感觉到自己到了地图以外的地方。跟在我身后的有很多人,有士兵、旅游者、开发商,还有内战时期复杂的自我屠杀行为。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们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更不用说他们已经在无趣的新的生活方式中受到了损

害,就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了巨型矮人一样。

任何有钱买一张机票的人都可以飞往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一个大城市,一家美国机场就是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和瓦加杜古的大门。我对此的反应是:那有什么了不起。城市对我一点吸引力也没有。符合我的性情的是偏远地区。

在非洲,作为一个姆赞古,我是人中的陌生人,这也就是“班图”的意思。我不是一个人,而是处在边缘上的某种鬼魂一样的存在物,我讲的话也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听不懂的。这是很好的一课。直到那个时候,我一直都不知道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相信他们是人,他们的语言就是上帝之道,陌生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人类,至少不是人所处的那种方式中的人类,陌生人的语言也不能算是完整的语言,而只是彼此不连贯,并经过浓缩的一串措辞的临时堆积。

仅仅凭美洲土语用词法本身,我就应该完全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表示“班图人”的班图这个词在世界各国文化当中有很多对应的名称。差不多每一个美洲土著的名字,比如因纽因、纳瓦霍等等,都可翻译成某种人,这里面的含义是,他们是一种人,而陌生人却不是的。例如,现在称为密歇根的地方,最早的人称自己为安尼新纳比,也就是“第一批人”。陌生人称他们为齐佩瓦族人,后来又演变成了奥济布韦,这是“象形文字制作者”的变种——因为他们在桦树皮上制作出了非常精美的雕刻文字卷。

最早与这些安尼新纳比人相遇的法国早期旅行者都没有发现这些文字卷,他们读不懂那上面的文字,他们只对那里的人们能够提供的皮毛有兴趣。当一个陌生者有非常明显的不利之处。旅行者总是有些迷茫,跟一个漂流者一样,他总会遇到没有

预料到的、非同寻常的问题。

另类的状态有可能成为一种疾病；当一个陌生人可以与体验一种疯病相比拟，他们会同样模仿非现实与非理性的事物，因为一切熟悉的事物已经远离他而去了。陌生人会感觉到某种受伤者或残疾者的心态。在《伤者与弓箭》一书当中，艾德蒙·威尔逊利用希腊的一个传说，就是菲罗克忒忒斯，把他当成一个暗喻，用以描述艺术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这个传说底下的意思是，菲罗克忒忒斯的伤是他性格的一个部分：“超能的概念与残疾的概念不可分离。”使菲罗克忒忒斯超乎众人之上的不仅仅是他威力无穷的弓箭，而且还有他的力量，是从他背负着伤病痛苦当中汲取的一股力量。他没有治好的伤使他得到一股贵族气。创伤与艺术之间（或疾病与力量之间）有联系的概念在威尔逊那方面并不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它一直存在于文学当中。在一部分来说，它就是浪漫主义运动当中伤心的艺术爱好者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博尔赫斯是个盲人，但他写道：“失明是一个天赋。”（“失明使人动弹不得，但它也是一种解放，是有利于发明的一种孤独，是一把钥匙，也是一个代数。[博尔赫斯《诗选》“不曲的玫瑰”序言]”）

在今天，对疾病的解释当中，最伟大的解释者是奥利弗·萨克斯医生，他把疾病看做是想像力的可能来源，尽管他从来都没有具体地举出菲罗克忒忒斯这个例子。他的病人都是传统的陌生人。在收集在《错把妻子当帽子》和《火星上的人类学家》当中的病案中，萨克斯医生解释说，一个人生活当中某个领域明显的一种能力丧失会使另外一个领域的能力得到增强，或得到极大的灵感。最近，在《色盲岛》一书中，他描述色盲患者虽然对颜色没有敏锐的理解力，但对他称为“亮度复调”的方面却有极其深

刻的理解。(在 H.G. 韦尔士的小说《盲者的国度》中,非色盲者跟有视力的人一样一点办法也没有。)他讲了很多例子,说明有时候医生没有病人敏锐,没有病人能力强,感受能力也更差。

当陌生者就是要保持一颗童心,跟孩子一样无力自卫,不那么聪明,而且必须要获取一门语言。在《看破声音》当中,他展现出自己对聋人的研究,他把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描述的婴儿时期学说话的过程与聋哑人学手势语言的过程相比较。韦特根斯坦对这种体验的分析将它与陌生人的两难境地相比:“奥古斯丁描述的人类语言学习过程,就跟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不明白那个国家的语言一样;也就是说,就好像孩子已经拥有了一门语言,只不过不是那样一种语言而已。”这正好就是陌生人所感觉到的内容:在一个新地方,他体验到了内在的无助感,并不多是一种幼稚症,就好像陌生人通过了一面窥镜。

在非洲丛林中生活很长时间,意味着我必须依赖非洲人的好客,就是尼亚萨兰的尼安雅人。没有我,他们可能会把一切照样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我却非常需要他们。我的第一项任务是要学习他们的语言,也就是齐切瓦语。之后,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尽管我还是感觉自己与众不同。在头一两年,我只有一部自行车供作交通工具用。我没有电话,很长时间没有电,有时候几小时没有电,有时候几天没有电。说好的一面,我离菜市不远,离邮局也不远。我喂了一些鸽子,并吃掉鸽子。我喜欢自己的学生。我在附近的村庄里有一些朋友。除开某些时期那些国家出现政治上的麻烦以外,除开有步枪枪管对准我的脸以外,我并不会感觉自己处在多大的危险当中,因为总体来说我明白那些风险是什么。尽管我有同情心,我有良好的意愿,但是,我知道自己生活在另外的环境当中,但是,那样的感觉并不是什么新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鲜事。从当作家的角度看,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另一个重要和常见的事实是,在我认识的非洲,甚至在我认识的东南亚,当地人并不经常考虑靠背井离乡当移民来解决问题。他们接受了生于斯,死于斯的命运,终老于自己所从出生的家乡。他们在别处并无家庭,也没有什么亲戚。一个终生生活在故乡的人往往觉得自己是一个社区的一部分,他/她有自己的责任。因为逃亡并不是一个选择,我认识的一些人都有很好的归属感。他们看得很远:他们一直生活在那里,土地是他们的,他们是一个文化的一部分,有很长的回忆,有深厚的根基,有古老的习惯和习俗。在这样的一个民族当中生活,使我的排他感更浓厚了,更加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而这样的感觉使我着迷。

那些不安的死者时常会来光顾那些地方,因此,它们比表面的样子更加稠密,因为大多数人都跟看不见的精灵的世界共享一种生存。祖辈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因纽特人有这么一个说法,他们觉得祖辈人死后立即出生的婴儿实际上就是死者的转世,而那个婴儿也会被称为“祖父”或“祖母”,并得到与长辈相称的尊敬和待遇。在与世隔绝的十年期间我到过的大多数地方,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一种信仰是:死者并非完全死去了,他们甚至都没有离开过;对于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来说,没有任何人是真正故去的,没有人真正远离了家乡。死者就在跟前,朋友们就在跟前,祖辈就在跟前。列维·斯特劳斯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写道:“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对死者不是尊敬有加的。”以我目前的岁数,我早已经做好保持祖先崇拜概念的准备,我相信精神世界的亲近,远胜于对一神教的信念。任何曾经因为失去父亲或母亲而伤痛过的人都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这样的话适用于已经过去的所有时间领域。

离开马拉维之后,我已经过了 25 岁,我在那里见过的一些人让我想到自己并没有被人遗忘。作为一个朋友,我并没有真正离开。对他们来说,已经过去的时间并不算长。这是因为我们西方人往往从单一一辈子的角度来测量时间吗?也许在某些地方,人的寿命极短(在津巴布韦,有人计算他们的生命周期约为 38 岁),生命周期是无用的时间测量单位。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海岸不远处的特洛布里安德岛上划了一天的船,漫长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靠近海边一处极小的村庄,想问问可不可以附近的海滩上露营过夜。“留在这里吧,”口齿不清的村人坚持说,“你会很安全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将监视我的行动。没有人问我准备在村子里住多长时间,尽管他们也很感困惑,不明白为什么我宁可选择睡在自己的帐篷内而不愿去他们的棚屋内享受他们好客的招待。因为担心染上疟疾——这在特洛布里安德岛是传染病,经常会死人的——那就是我宁愿一个人单独住的惟一理由。我心满意足地划了两个星期,之后划走了。

他们大喊:“以后再来!”

六个多月之后,我又回来了,回到那里后,有个妇女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把我的小艇拖出泻湖,她对着我微笑,说:“我们刚好在说你的事情哩。”

她随意的欢迎姿态使我开心。我重新返回那个地方并无任何特别惊人之处。感觉起来就像刚刚离开一样。我觉得,在中间的那段时间内,我的生活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过去了。那代表一个收获季节,一次风暴,或者有几个人死去了。但是,特洛布里安德岛上并没有人真正死去。死者只是去了另外一个岛:他们的灵与稍北一点的吐

喜爱新鲜空气的人

玛同在。

村人自己对时间流逝的态度使我返回的时候不那么紧张。特洛布时安德岛人有自己的协议，他们有自己的欢迎仪式，还有礼物送给我，但是，不管那样的情景有多么动人，都没有在我的心里唤起美国人回家时的特别感受。我乐于觉得：我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占据了一个位置。死亡或离开都只是轮回的一个部分。

与来来去去的人们建立起友谊，不管多长的时间流逝过去，那样的友谊并不会因为人的消失而淡漠。在特洛布里安德岛上，重要的是你在村庄意识当中的存在。如果有人谈到你，或者如果你出现在他们的梦中，那你就在场：你拥有了现实。

身处异乡最有戏剧性的一个例子，是两种极其不同的文化第一次相遇的时候。这样的交流可以用“第一次接触”的说法加以总结。

包勃·康纳利和罗宾·安德逊于1987年出版了《第一次接触》，在那本书中，他们描述了在新几内亚的一系列事件，他们发现，1980年代的新几内亚高地人在澳大利亚探勘者于1930年第一次到达高地时就在场。当时，澳大利亚人急于寻找黄金，但是，村人看见他们在他们的峡谷中过河，就以为这些澳大利亚白人就是他们祖先的魂灵。所有人都用“灵”这个词来描述那些陌生人。

其中一名见证人基鲁潘诺·伊萨埃说：“他们离开以后，人们坐下来讲出许多故事。他们根本不了解白皮肤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很远的地方。我们只知道高山的这一面。我们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活人。我们相信，当一个人死去以后，他的皮肤会变成白色，他会跨过边界达到‘那个地方’——死去的安息